

历史形成与历史地位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次伟大革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伟大飞跃。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邓小平理论发源于毛泽东，形成于邓小平，发展于江泽民，指引着中国人民胜利跨入 21 世纪。

论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 历史形成的内在规律^{*}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次伟大的革命；在两次伟大的革命中，毛泽东和邓小平领导人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两大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既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又是不断探索和创新的成果。研究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历史形成的内在规律，对于我们深刻把握这两大理论的科学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

我们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二次伟大革命要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次伟大革命的深刻意义还在于，促使我们党在理论上成熟起来，为两次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实践基础。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但幼年时期的党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道路特殊性的认识还比较幼稚。陈独秀只看到中国革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放弃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犯了右倾错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仅看到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一面，要在民主革命

^{*} 此文系安徽省教育厅1999年省级重点建设课程《邓小平理论概论》研究成果，原载《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1期。

时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国民党反动派“决战”因而犯了“左”倾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

1927 年大革命的失败和 1934 年红军反“围剿”的失败，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1927 年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共产党员从 6 万人减少到 1 万人；1934 年红军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从 30 万人锐减为 3 万人，中央红军被迫从江西革命根据地撤离，到达贵州遵义时，形势已极端危急。中国共产党人在大失败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需要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需要毛泽东思想指导。遵义会议终于确立了毛泽东在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毛泽东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实际出发，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对象、任务、前途等问题，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新”，就“新”在它虽然在内容上是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在其领导者、主力军和发展前途上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人既要反对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割裂开来，又要反对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并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及时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思想全面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在必然性，为中国第一次革命指明了方向，中国第一次革命的胜利正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发展道路也是不平坦的，1956 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课题提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面前。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也犯了两次大错误。第一次是 1958 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盲目赶超，不讲科学，违背经济规律。粮食生产搞浮夸，放卫星；工业生产搞全民大办钢铁，一年之内全国有 9000 万人上山炼钢；在生产关系上搞“一平二调”，吃饭不要钱，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

义”，结果遭受严重挫折，经济损失 1800 亿元，人口减少约 2200 万；党内高层领导对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认识发生重大分歧，1959 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彭德怀的争论、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错误地批判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实际上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失误造成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第二次大错误是 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长达 10 年的“文革”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场大灾难。这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的运动，踢开党委闹革命，整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导致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全国内乱，经济损失 5000 亿元，大批党政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惨遭迫害，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以阶级斗争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政策，导致人民生活极为贫困，社会主义优越性成了一句空话。“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促使我们党冷静地思考在中国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1978 年底我们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在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邓小平理论正式创立并指导我国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表明，经过失败和挫折，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也逐渐聪明和成熟起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实现了马列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纵观两次伟大革命与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过程，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实质上是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两次伟大革命是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动力和源泉，两次历史性飞跃是以两次伟大革命为基础的。正是两次伟大革命前期的艰辛探索，正是总结了两次伟大革命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两次历史性飞跃才得以实现，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

理论才得以形成。

二

我们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性认识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建立在两次伟大革命的基础上，而以两次革命的实践为基础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得以实现的关键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什么时候做好了马列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篇大文章，实现了对革命问题认识的飞跃，什么时候革命和建设就会胜利；反之，如果‘结合’的文章做得不好，认识飞跃就不可能实现，革命和建设就受挫折。

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一般有两种状态：一种是表层的、片面的、抽象的结合，那只能是理论与实际的脱节或错位式的结合；一种是深层的、全面的、具体的结合，那才是科学的、正确的结合。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之初就努力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1921年党的“一大”提出了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但未能提出阶段性目标；“二大”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分清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但未弄清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1923年党的“三大”提出要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但未解决革命的领导权，也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1925年党的“四大”提出要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当时陈独秀并不懂得‘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真正内涵，完全是抽象地空谈无产阶级领导权，当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之时，共产党人完全是被动挨打。

是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应体现为对农民革命的领导，体现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和建立工农革命政权。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

枪。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1927年8月18日，他在湖南省委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要夺取政权。我们党以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60%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是正确的。

在第二次伟大革命之初，我们党也已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毛泽东1956年4月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这一探索的重要体现。但遗憾的是这一探索后来发生了失误，其根本原因还是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出现了错位和偏差，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犯了大跃进盲目求快、人民公社化盲目求纯、“文化大革命”斗“走资派”和灭资兴无、狠斗私字一闪念等超越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这正验证了邓小平1956年在《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一文中所说的：“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第二次伟大革命之所以能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因为邓小平很好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重大课题。过去我们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既未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原理，也未正确把握中国的现实国情，而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把马列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首先，邓小平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是以马克思主义

理论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过去我们对发展生产力重视不够，相反却大批所谓的“唯生产力论”，以至于我国长期未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必须坚决地、迅速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中国人民从贫穷走向富裕。

其次，邓小平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的制定是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紧紧抓住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过去，我们长期错误地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当成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误将阶级斗争当作党的工作中心，造成经济发展长时期停滞不前。邓小平正确地分析国情，明确指出，现阶段我国的最大国情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产力不发达，难以满足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必须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党的唯一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是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确立“一个中心”的。

再次，邓小平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还是以当今时代主题为背景提出来的。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世界大战有可能推迟或避免，我国完全可以争取一个较长时期进行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正是基于对当今时代主题的新判断，邓小平提出要一心一意搞建设，集中精力搞建设，始终如一搞建设。除非打仗，打过仗还搞建设。

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表明，在两次伟大革命的初期，由于缺乏经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出现偏差和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伟大在于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立足于国情和世情实际，才找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点，在两次历史性飞跃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三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形成过程中体现出的重要品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核心问题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创新，毛泽东和邓小平正是因为思想解放，独立思考，在实践中努力创新，才实现了对中国两次伟大革命规律认识的历史性飞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许多问题在马列主义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如果思想不解放 唯书、唯上 脑袋长在别人的肩膀上，就不可能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实际上都主张中国革命要走“城市中心”的道路，其依据是别国的革命经验，因为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都是城市工人暴动。毛泽东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走出的一条新路。当时有人不理解，甚至指责毛泽东带领工农红军上井冈山是要去当山大王。毛泽东说，我就是要当红色的“山大王”。因为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共产党人难以在敌人势力强大的城市求得生存和发展，只有在敌人统治相对薄弱的农村取得突破。

毛泽东探索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虽然在

马列主义书上找不到现成的表述，但由于它最符合中国的国情，因而最符合马列主义的精髓。邓小平说：“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他还指出，毛泽东确实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得非常好，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采取与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由于充分尊重中国的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顺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

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毛泽东独立思考，从实际出发求到了中国第一次革命之“是”指导中国第一次革命取得了胜利；在第二次革命的起步阶段，毛泽东作了积极的探索，但后来逐渐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结合方面发生了错位。譬如，1953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党制定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消灭富农的合作化阶级路线，这一阶级路线从政治上保证了合作化的顺利完成；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富农阶级已经被消灭，贫农也已不再是贫农，但这一农业合作化的阶级路线仍被长期执行。政策变动的滞后导致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使广大农民摆脱贫穷走向富裕；而长期执行依靠贫农、消灭富农的阶级路线，结果搞成了越贫穷越光荣，致富反倒成了罪过，造成农村经济停滞、农民的温饱问题长期未能得到解决。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才得到改变。

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的结合需要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不断地研究情况和回答新问题，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创新。邓小

平就是这样做的。他在领导第二次伟大革命的过程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列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我国是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由于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所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不发达。进入了社会主义，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还不发达，这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既是社会主义，其社会主义在事实上又还不够格，这是一个矛盾。有的人只看到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看不到我国生产力的不发达，思想超越了实际，在政策的制定上犯了“左”倾错误；有的人只看到我国生产力落后，看不到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主观落后于客观，在思想主张上犯了右倾错误。

邓小平从实际出发，正确分析当代中国的国情，全面考察我国已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还不发达这两个方面实际，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在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中找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邓小平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反映和表述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这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创新。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大会上说：我们党是用了 30 年的时间，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才开始认识了这个当今中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实际。

在对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把握上，“左”“右”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都是教条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原则出发，仅抓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方面的特征就片面地做出判断，其方针政策必然脱离实际并发生严重失误。邓小平把握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方面矛盾性特征的内在统一性，使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有了清醒的认识和科学的定位。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既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

充分发展阶段的跨越，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阶段不可超越；又要看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决不能补什么资本主义的课，但市场经济的课非补不可，因为社会化大生产需要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进行理论创新的产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上和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归根到底都是由于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坚决纠正了过去那些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方针政策，使我们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真正符合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又一重要体现。首先，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是照搬书本和别国模式的结果。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关于未来社会的原则设想没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位置；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建设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和苏联模式的影响我国也形成市场经济姓“资”计划经济姓“社”的思维定势。邓小平对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姓资姓社”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他在1979年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其次，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提出的。实践已经证明，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不再适应现实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必须变革僵化的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既可为社会主义经济注入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又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再次，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把制度与体制区别开来，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定位在体制层面，进而把市场经济体制

与资本主义制度脱钩，并根据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对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概念。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巨大成功雄辩地证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和发展趋势，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创新和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及其 21 世纪再创辉煌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在总结两次伟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的。两大理论的创立过程是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实事求是、不断创新的过程。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求索创新，找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点，也就实现了党对有中国特色的两次革命道路认识的历史性飞跃。实践“结合”和创新是没有止境的。来源于伟大革命实践的伟大理论又给新的伟大实践以指导，并在新的伟大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历史形成过程及其内在规律。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的起点^{*}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次伟大的革命，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理论界认为，第一次革命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第二次革命则是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我们认为，1956 年党的“八大”是第一次革命的终结和第二次革命的开端，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第二次革命走向成熟的起点。全面认识第二次革命的历史开端和成熟起点，对于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年来领导的两次革命的关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

研究中共领导的第二次革命的起点，必须对第二次革命与第一次革命的内涵作出界定。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而言的，明确界定了两次革命的内涵，我们也就明确了第一次革命与第二次革命的外延关系及其时间跨度。

首先，第一次革命的任务是要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就决定了第一次革命只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1956 年以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纳入第一次革命的范畴。

中国第一次革命的上限是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下限应

^{*} 此文系 1999 年参加安徽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庆祝建国 50 周年学术讨论会交流发言论文，其要点曾以《中国第二次伟大革命与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为题编入《邓小平理论概论学习指导》（汪青松主编，南方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版）

该是 1956 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指出，中国革命要分两个阶段或分两步走。第一阶段即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阶段即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两步走”的提法不同，实质则是一致的，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都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革命的对象都是旧的社会制度，革命的根本目的都是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江泽民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很明显，1956 年以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已不是变旧中国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不应再将其视为第一次革命的内容。

其次，第二次革命的任务是要把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决定了第二次革命应包括改革、建设、发展等，1956 年以来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史就是以此为重要内容展开的。

1956 年我国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即第二次革命的开始。“八大”的历史性贡献是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从革命转向建设的政治路线。“八大”政治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起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上解决，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宣布，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八大”结束后不久，毛泽东说，这个世

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这个世纪还有四十几年，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邓小平 1957 年也指出：“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从“八大”通过的文献和毛泽东、邓小平的讲话可以看出，虽然我们党在当时尚未提出“两次革命”的概念，但已认识到建设与革命的区别，把第一次革命的下限定位在 1956 年，即以“八大”为分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划分开来了。应该说，“八大”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是正确的，1956 年“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理应属于第二次革命的范畴。

再次，界定两次革命的内涵，必须区别制度性革命与体制性革命、产业性革命这两种类型的革命。革命作为根本性的变革，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革命指的是阶级斗争式的社会制度革命，广义的革命指的是加速现代化建设的产业方面的革命和体制革命。毛泽东所讲的 20 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邓小平所讲的革命的任务完成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其“革命”指的是狭义的制度性革命，“建设”指的是广义的产业性革命。

把革命的两种类型与两次革命的内容联系起来看，狭义的制度性革命即第一次革命，广义的产业性革命和体制性革命即第二次革命。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区别两种类型革命和两次革命的基础上对第二次革命的内涵都作了阐述。1958 年毛泽东说：“现在要来了一个技术革命，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所谓技术革命即产业性革命。1978 年 10 月和 12 月，邓小平两次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1985 年 3 月，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毛泽东和邓小平从产业性革命和

体制性革命的层面上对第二次革命的阐述表明，1956 年党的“八大”以来的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变革不是第一次革命那样的狭义的制度性革命，而是广义的以体制性革命和产业性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革命。

二

革命是实践性范畴。研究第二次革命的起点问题，不能仅仅从其概念内涵即第二次革命的任务和内容上来判断，而应从实践的角度进行考察。1956 年～1978 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状态，给判定这一时期革命的性质带来了诸多困难。要阐明 1956 年党的“八大”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历史开端，必须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是 1956 年～1978 年我国历史发展的基调和主线之一，不能因为当时我们党未明确提出第二次革命的概念就不承认这一革命的客观存在。

实现现代化、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1956 年党的“八大”宣告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1957 年 3 月 17 日，他在天津党员干部会上说：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我在“八大”上面说了。我们党要求搞建设，跟自然界做斗争。4 月 30 日，他在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谈话时说：过去做的是阶级斗争，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如此，是人与人开战，人打人，人内部造反，花了几十年的精力。阶级斗争以后还会有的。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1957 年 6 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再次强调：“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入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毛泽东在这里明确划分了第一次革命与第二次革命的时限，